

# 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

——新时期乡土小说论

CUIZHIYUAN

● 崔志远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 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

——新时期乡土小说论

CUIZHUYUAN

◎ 崔志远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新时期乡土小说论/崔志远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

ISBN 7-5068-0676-2

I.乡… II.崔… III.乡土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353 号

---

责任编辑 张 瑞

封面设计 愚星工作室

## 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

——新时期乡土小说论

崔志远 著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邮政编码:100031)

北京市通州区曙光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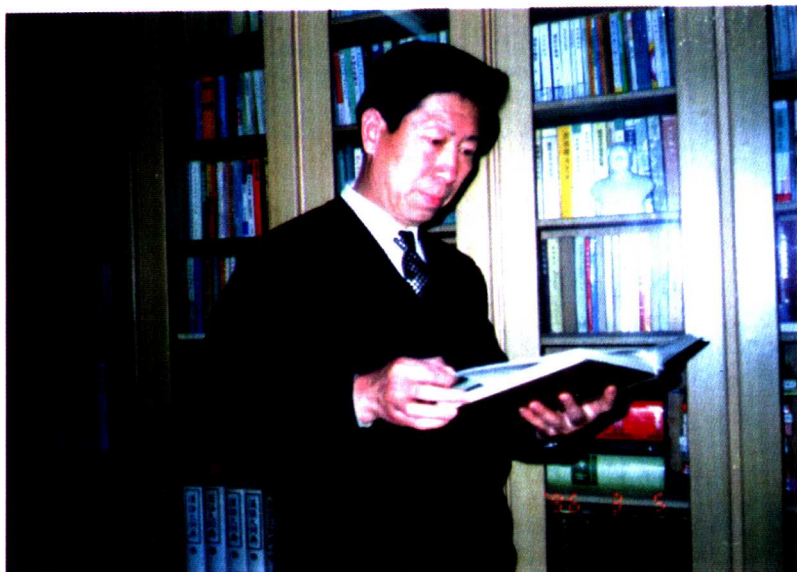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00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

印数:0001—1000册 定价:20.00元



## 作者小传

崔志远,笔名致远,1946年10月生,河北省晋州市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80年代以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国家级、省级报刊及高校学报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有学术专著《毛泽东艺术创作论》、《运河文学体系论》、《当代文学审美潮》;主编高校教材《书法艺术通论》、《中国当代文学教程》、《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丛书》(含《教师口语》、《书写技法》、《课堂教学与班级管理》),参加编写《书法教程》、《美育学教程》、《美学导引》、《河北高等院校学报志》等,计16种。曾获河北省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类一等奖,第一、二届华北区文艺理论专著一等奖,第四届河北省文艺理论“金鹿奖”,河北省高校优秀社会科学专著二等奖,第四届石家庄市文艺繁荣奖等。

## 第一章 乡土文学的历史回顾

## 一、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

80年代初，刘林霖四处奔走，倡导“乡土文学”，并以《潜桥人》为开端，自觉地进行乡土文学创作。他写信给孙犁，希望得到当年老作家的支持。孙犁却不无遗憾地对刘林霖的主张，撰文《关于乡土文学》，发表在11月号《北京文学》上。文中谈到，鲁迅曾批评过文坛的小说必为“乡土文学”，“这个批评，很难说是批评，也很难说是捧杀。因为，鲁迅早已写了很多描写‘故乡’人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他并没有有称过这些小说为‘乡土文学’。别人也没有这样称呼过，也不应该这样称呼。”他批评刘林霖说：

就我个人认识来说，我认为林霖实际可以不这样说，也可以不必这样捧杀的。因为，就文学艺术来说，撇开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之为“乡土文学”，而反之言之，则所谓“乡土文学”，实不存在。文学形式，包括内容和形式，不能永久不变，历史流传的文学作品，尚且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乡土文学”。  
 注：说，孙犁的文章不足够到见解，无论对刘林霖的创作，

作者手迹

## 序一

郭志刚

“乡土”和“地缘”这样的字眼，先就让我感到几分亲切。“一方水土一方人”，人生情缘不仅与生俱来，也与“土”同在。试想，谁的心里、梦里没有自己那个“生于斯，游于斯，嬉于斯”的家乡呢？这个家乡不管在天之涯，还是在地之角，什么时候想起它来，心里都会热乎乎的。怪不得许多人，包括一些现代著名作家，总爱称自己是“乡下人”，大概在他们的自谦里，正包含着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吧。

这部《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启动了一个在当前来说尤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前些年人们谈“洋”谈得多，这些年人们又开始来谈“土”了。谈“洋”也好，谈“土”也好，这都应该谈，谈得对。因为两个都谈，才是真正的面向世界，也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但是，如果认真想想这些年来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轨迹，我们就不能不说，从谈“洋”又回到谈“土”，这正是认识深化的表现。因为人们终于又一次看到，如果只谈洋，甚至崇洋，并不能和世界融成一片，相反，会遭到世界的拒绝。那样，不但没有自己空想的现代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未来。

话说回来，也不能光谈“土”。因为即使是乡土文学，那也是处于世界某一位置的乡土文学，它必须接受周围世界的审视和选择，也必须接受各种思潮的冲激和磨洗，它要同世界交流，在向世界贡献新知新作的同时接受它的反馈。就是说，它不能封闭式地遗世独立，也不能慢吞吞地裹足不前——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星球，这个星球转动得多么快，它最好也跟着转动得同样快，以免被再次甩到

后面,甚至被甩到“外层空间”。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世界在“变小”,在逐步“贯通”和“磨合”,在这种情况下,乡土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一定和过去不同,和古代更不同。因此,如果一头扎进“土”里去钻不出来,那也是不识时务的。

本书是这些年来由主要谈“洋”到转而谈“土”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产物,它体现的不是倒退,是前进,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作者并非墨守成规者,人又很聪明,我们想到的,他也会想到。他谈乡土文学,事实上是一种重新认识和重新选择,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谈“土”。他的研究工作不但具有前沿性,成果也是显著的。他讲的是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但看看内容,早已“超越”了新时期好几个时代——它的根须,一直伸展到远古,内容也远非限于小说。书中讲的那些不同地区(如燕赵、三秦、吴越等等)的地缘文化,脉络清楚,有历史感,分开来看,很像是各个地区的“小文化史”。讲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不见得非要说那么多东西;但作者既然说出来了,还是叫你读得很有兴味。而且经他演绎、说明,许多内容,也确实有助于人们明白地缘文化对创作的深远影响,这对读者深入体味新时期不同地区小说的渊源所自和艺术风韵,都是很有帮助的。作家的创作,常常天马行空,驰骛八极,眼观现实,心游大荒,千年流光,可以化为翩然一梦,天涯陌路,也可变得柳暗花明。这样,刻舟求剑或就事论事式地研究创作是不行的。志远这部书,由今及古,似远而近,网撒得很大、很开,所论即或不能都那么周延、妥帖,他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可取的。

从修辞色彩来说,“乡土”和“地缘”这样的词汇,应该归入暖色调一类,它们之所以会给人以温馨感、温暖感,是这些字眼常常触及人们中枢神经的一个敏感区域——感情记忆。乡心和乡情,就是感情记忆的产儿,它的出生,也如婴儿呱呱坠地,是带着母体的

热，也带着母体的血，甚至会哭，会喊……总之，一切都是鲜活而生动的。乡心和乡情在人群中拥有一个最大的共鸣区，它应该是乡土文学永恒的灵魂和主题。“地缘”也是这样，如果说血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粘合剂，那么，“地缘”就是地区群体之间的粘合剂，它们的牢固的凝聚力，都来自那个颇有几分神秘性的“缘”。“缘”，首先是一种物质元素。但是，单一的物质并不始终具备粘合的作用，正如金钱财物并不是家庭关系的可靠保障一样。只有当“缘”升华到感情境界、精神境界，这种粘合作用才是强大的、可信的。所以，这个“缘”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化了的“情”，或“情”化了物质。乡土文学也好，地缘文化也好，都要深挖这个“情”，不断解开这个“情”字结，这样，才能做出富有启示性的好文章。在这方面，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但似乎还少了一点儿“自觉”，因此未能保持工作的连贯性。

话是这么说，叫我去做，我也做不好。不但做不好，对于乡土文学，我并没有下过什么功夫，这些话，是看了作者的稿子才想到的，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之类。

至于新时期的小说，近年来我读得更少，发言权也就更加有限。志远在我这里当过访问学者，他要做这个题目，我是支持的，虽然我知道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包括乡土文学的名称是否能够成立，都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由于上述理由，我连同意什么也说不大上。因此，要说是我“指导”志远做了什么，那是当不起的。即使我们在交流时我说过些什么看法，那也是言者原无深意，听者别会有会心，即门外之见，为门内人变废为宝，不是我有什么奇特的看法，而是他另有新解。志远心慧，他有能力做到这点。此外，他也心热。在师大访学期间，他以此心向学，也以此心待人，是一个把事业心和平常心、为自己做事和为别人做事视为一体的人。这一点，构成了他在本质上的朴素和聪明。这样的人，应该多有成功，我们



应该向他表示祝贺。

离开北京这么多年了，志远还没有忘记这里的许多熟人和朋友，光是为我和我的学生，就做了不少实事。对此，我有回报他的心，却无回报他的力，虽然志远不图回报。古人说，做人忌“太枯”（即少交往、少友情交流、少助人之心等等），对此我是警然于心的。确实，包括志远在内的许多朋友为我做过许多事，而我为他们却做得太少，虽然心里感念他们，却不能不常常感到惭愧。

志远要我做序，我自知不是什么合适的人，但还是答应下来，聊副厚望。不巧的是，近期事情忙而且迫，书又等着发排，我只得挑着看了一些章节（大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便率尔操觚。不过，我越看下去，就越觉得这篇序实在多余，因为书中不仅有许多精彩的议论，在材料的剪裁、组织和结构的安排上也很有章法，使你看了前边的就不免想看后边的。在近年来有关新时期文学的理论著作中，像筹划得这样严密而又头头是道的书，还真不多见。再有，它的知识含量也大，这对于求知欲强的读者，无疑也是一种诱惑。一部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如此吸引力的书，序就往往成为不讨人喜欢的赘疣，所以我还是知趣些好，不再把话拉长。

1997年9月14日夜

## 序二

王惠云

在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倡导当在20年代初,而在创作上取得实绩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是鲁迅。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来,乡土文学绵延不绝,不断变化,呈现一种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乡土文学理论也伴随着创作的发展逐渐丰富和提高。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20年代初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等文章中倡导在先,30年代中期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审美特征做了极简洁的论定,并对当时乡土文学创作诸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做了精辟分析;80年代末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以专章论述了乡土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流派的渊源、理论、特征、对现代小说发展的贡献,并对初期乡土小说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了评析,等等。严家炎把论题限定在“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这个范围,显示了论述的完整性、科学性。严家炎这部专著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包括乡土小说的研究推进到一个重要阶段,在学术界发生了广泛影响。他的许多观点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多方面的启发。比如,他认为“30年代的乡土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随着创作倾向的不同,实际上作家们已经分道扬镳(如京派、社会剖析派)……到40年代以后,更朝向具有地区特点的流派(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发展。”他是在论述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在其形成期所建树的开辟道路的功绩时说这番话的,他认为“这些都是由20年代奠定了基础的”。我们也可以从乡土文学的历史发展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段话,如果从历史发展来理解,则乡土文学在近六十年历史沧桑巨变中审美形态嬗变的轮廓已经包含在这一段文字之中了。后来的研究者

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着新的思考的。

近年来,随着乡土文学的发展,乡土文学的研究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崔志远的新著《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便是其中的一部。他把书稿拿给我看并嘱我就书稿说一点什么。我很为难:我自知对乡土文学并无深入的研究,所谈未必恰当;推却又怕冷淡了作者的热情,最后还是答应下来,就随便写下一些想法。

作者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新时期乡土小说,预设的理论视角是“拟从地缘文化视角对新时期乡土文学进行剖析和批评”。这无疑富于探索性的。作者广泛参阅中外学者的相关论述,熔铸新见,从一个方面深化了乡土文学的研究。

应该说,这是一部有深度的关于当代乡土文学文化意蕴评析的专著。为了顺畅地、富于逻辑性地展开自己的论证、评析,作者对于所确立的理论前提、核心概念都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因而保证了在论证过程中的严密和一贯。这对于一部学术著作也许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在做这一切时,有些部分显得拙直,但是这种努力却也同时表现着作者严谨和求实的治学态度。比如作者对地域文化、乡土文学以及二者关系的界说和阐释,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谓地缘文化(或称地域文化),按照作者的理解,“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当然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其‘地理学’的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观易貌,民人迁移,只剩下大致所在的地区了。”但是,来自“地缘群体”的地缘文化特征,如秦文化的厚重,燕赵文化的慷慨,楚文化的绚丽,都顽强地保存下来。“地缘文化积淀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风俗文化史,是构成民族和地域差异的最基本的因素,也是乡土文学的最基本的特征。”作者经过一系列的论证,指明地缘文化同乡土文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既然地缘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地方性,而乡土文学的重要特点

在于它的地方色彩。地方性便成为它们息息相通的‘灵犀’，我们完全可以用‘地方性’架起沟通二者的桥梁，并沿着这座桥梁走进乡土文学的腹地，探幽索微，采撷成果。”这既是一个论证的过程，也是全书的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作者以丰富的材料评析了“运河文化”如何濡染了刘绍棠并使其作品具有了燕赵风骨的崇高的丰采；“商州文化”如何以其“古拙的浑朴性，进取的开拓性，奇幻的神秘性”影响了贾平凹的艺术思维和审美心理图式；吴越文化中“水土柔和，人性柔慧”的民风如何化入汪曾祺笔下风俗画中淡泊宁静的境界……。从地域文化的理论视角研究某一地域文化是如何影响了乡土文学的创作的，对于既成的乡土文学作品开掘它本身蕴含的独特的文化意蕴以及映现出的独特的色彩，这在当代乡土文学的研究上无疑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种研究的积极的成果，深化了对当代乡土小说作家创作审美意蕴的认识。作者对刘绍棠的研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把刘绍棠这样一位在当代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的作家置于燕赵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加以阐释和评价，从而引出一些新鲜的见解。刘绍棠是运河的儿子，新时期以来倡导“乡土文学”并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共12卷，计500万字。这样一位先后在自己生身之地生活了三十九年，并立志写自己家乡在历史沧桑岁月中深刻变化的作家，他的创作的特点是什么？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又是什么？作者在本书中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概括刘绍棠创作的审美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这种探索无疑是富于创新性的。我们看到，作者以较多篇幅详尽具体地梳理了燕赵文化的源流、构成、特征；由于这种梳理紧密结合历代文学创作实际，因而切实而不空疏。特别是对燕赵文化表层及深层内核的分析为后面对“运河文学体系”内涵的解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样，历史与现实映照、宏观与微观

结合,刘绍棠的小说创作不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长河中一个飞扬的浪花,是燕赵文化丰腴历史土壤上长出的枝叶婆娑的大树。

应该指出的是,刘绍棠的富于个性的创作风貌并未消融到一般的文化分析之中。作者逼近刘绍棠的方式是以“乡土文学”为中心,以开掘“运河文学”的文化内涵为重点,在复杂的联系中归纳出刘绍棠创作的几个相关的层面,而以“运河文学体系”涵盖之。论证的逻辑系统是这样的:燕赵文化—运河文化—乡土文学—小说创作形象系列—主要形象系列的审美特征:燕赵的崇高。理论推演的结穴处是创作个性的审视。作者认为,“燕赵的崇高”是刘绍棠小说创作在审美形态上的主要特征。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作者认为,“运河文学”的核心是一种稳定的恒常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运河儿女身上的具体表征而“刚风烈气”,他们活得刚烈,死得刚烈。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刚风烈气”中由于融入新的特质而与富于原始色彩的粗豪相区别,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儒文化意蕴、多情和达观。这构成它新的内涵。“在这个整体中,刚烈和多情相反和相成形成一种丰富和雄浑,我的因子更增强着这种丰满雄浑的气势”,“这种性格正是古老的燕赵风骨的时代显现,因此,我们把运河文化性格表述为:燕赵的崇高”。这也成为刘绍棠作品中主要形象系列的总体的审美特征。作者在大量实证分析之后概括出的这些观点,独辟蹊径,引导读者用新的眼光去观照刘绍棠作品的价值,去重新发现作品中包蕴的文化特质,而得到新的领悟。

对刘绍棠的评析如此,对其它作家如贾平凹、汪曾祺、高晓声的评析也使人耳目一新,富于启发性。当然,就个案研究而言,对所论作家的评析并不都是精细而独到的,生涩或粗疏的情况,容或有之;但从整体看,全书所涉及或重点评析的乡土文学作家以其厚

重的文化意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还是构成了新时期乡土文学恢宏的景观,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贡献。

乡土文学存在着、发展着,人们对它的评说也在不断深化。这种评说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即以地域文化理论视角研究乡土文学而言,已出版的著作也不只崔著这一本。我想说的是,在乡土文学研究的谱系上,崔著似应占一个位置,他的研究为我们思考新时期乡土文学提出了不少问题。是耶非耶,读者明鉴。匆促即此,权以为序。

1997年12月5日

## 引言

任何艺术批评都必须有“批评的武器”，即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批评的武器”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由人的艺术活动的要素及其组合规律决定。文学艺术活动的因素很多，撮其要为：主体、客体、心理和社会四要素。四要素以主体和客体的联结为纵轴，以心理和社会的联结为横轴，构成一个艺术活动坐标系。艺术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便在这个坐标系中产生。这个坐标系虽复杂，却也可以找出艺术批评的几个基本视角：①、由主客体关系形成的艺术哲学，包括主观性的艺术哲学和客观性的艺术哲学；②、研究文艺社会性的文艺社会学；③、研究文艺创作心理因素的文艺心理学；④、主体和客体相作用，心理与社会相交融而产生“文本”，于是有研究文本的文艺文本学，也称文本批评；⑤、文本与社会结合，为读者的主体心理所接受，形成文艺接受学；⑥、处于四要素深层，对四要素发生作用的还有文化，于是有从文化视角研究艺术活动的文艺文化学。六个分支构成艺术批评理论的基础，完整的艺术批评体系应是这六个分支的综合与交融。然而，和平和战争相交替的历史总是形成艺术批评理论顾此失彼的阶段性缺陷。一般地说，在和平时期，人们强调艺术的审美性和娱乐性，关注文本形式及技巧，文艺文本学受到重视；在战争年代，国家危亡，社会动荡，人民罹难，文艺往往成为一种斗争的武器和工具，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文艺社会学广泛流行。这在20世纪前期表现尤为鲜明，两次世界大战，使许多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以全部的人力与物力保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完整，文艺也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文艺社

会学成为世界性课题。我国的现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应运而生。

我国现代文艺批评理论主要是文艺社会学,虽然,它不无古代“知人论世”的原型意识,却主要是五四以来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发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经历了20~30年代多种批评模式的竞争、删汰,于40年代初步形成体系,50年代又吸收苏联艺术批评的营养,定型为带浓重的政治色彩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模式以文艺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为立论根据,以阶级性、党性为核心范畴,以政治教化和认识作用为功能价值标准,以认识论的反映论为哲学依据;它还吸收了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果,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形成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的概念体系,并由此派生出社会背景(主要是阶级关系)、作家生平(主要是阶级出身、阶级态度)、作品分析(主要是社会政治内容分析)的三段批评程序。这种批评模式的历史功绩是,打破了梁启超、王国维以前千余年来文艺批评的点评式、感悟式的传统模式,适应历史的发展,建立了完整的学科形态的艺术批评理论,划出了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新时代。

然而,这种带浓重政治色彩的社会学批评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适应一切时代、一切阶级和一切语境。50年代,我国进入和平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斗争逐渐转为经济建设,它日益出现“不适反应”,并一步步走进误区。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更大变化,波澜壮阔的文艺创作每年、每月乃至每天都在更新着自己的面貌,冲决着僵化了的批评模式,社会学批评艰难而痛苦地重新认识社会,认识文学,进行着“思维变异”:(1)、社会生活的中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文学艺术不得离开阶级斗争中心,回到自己的文化本位,寻找自身独立的文化品格。(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通俗商业文学大摇大摆走进艺术殿堂,严肃文学受到强烈冲击而处境尴尬,理论批评的天职遭受文化广告和商业谋



略的排挤,文学不得不再次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文学的性能、作用和地位的转移,一方面使文艺社会学的旧批评模式陷于危机而步步失范,另一方面又为建设新的批评模式提供现实语境的契机。危机与契机共存,衰落与新生同在,批评范式的转换期渴求着风的启迪和雨的润滋。于是,艺术批评新方法和新观念的欧风美雨潮水般涌入中国文坛。

靠引进国外新观念和新方法以自新,是世界文艺批评史上常见的现象。英美的新批评、德国的接受美学等在初兴之际,都曾出现过翻译引进热。我国新时期的翻译引进热有独异的个性:其一,它出现在文化的长期封闭和文革的专制之后,对旧观念的反叛和对新思想的焦渴如冲破火山口的岩浆,异常热烈和壮阔,同时,也存在追求时髦的盲目性和无所措手足的困惑感;其二,它将西方几百年来不同时期的艺术理论做了共时性的平面化处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杂然并陈,交相纠结,这使我国的文学理论界目迷五色,应接不暇,多于表层扫描,缺乏深层体察和总体观照。

翻译引进的各种西方思潮和流派,同我国的批评传统碰撞、矛盾、结合,逐步删汰了生吞活剥的搬用,形成中西方视界的融会,开始向批评的实际操作发展。

我国当前的批评界,文艺社会学批评,已基本摒弃从属论、工具论的“左”的政治因素,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寻找着与当代思潮的结合部,逐步走向其当代形态:由只注重从一种社会因素研究文艺的单因论走向注重多种社会因素的总和作用的多因论;由只注意研究作家创作意图和作品社会背景的单维论走向研究整个文学活动的各个维度的多维论;由企图直接由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推导作品价值的直线论走向考虑到社会文化心理、艺术文体惯例等中介作用的中介论。与此同时,新潮批评逐步发展起来,文化社会学以外的五个分支均有涉猎:在艺术哲学方面,有带主观色彩的法